

# 目 录

## 性自命出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父亲的浪漫 .....      | 3  |
| 母亲的胆识 .....      | 10 |
| 伯父的遗憾 .....      | 13 |
| 我的初中文老师 .....    | 16 |
| 故乡的月 .....       | 19 |
| 我从小就喜欢面对群山 ..... | 22 |
| 蜻 蜓 .....        | 25 |
| 小粉红花 .....       | 27 |

## 触摸历史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别了故乡，别了山城 .....    | 31 |
| 1948 年的北大中文系 ..... | 36 |
| 快乐的沙滩 .....        | 38 |
| 阶级斗争第一课 .....      | 42 |
| 历史的错位 .....        | 45 |
| 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.....    | 52 |
| 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小记北大鲤鱼洲分校 .....  | 59 |
| 忧伤的小径 .....        | 65 |
| 献给自由的精魂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我所知道的北大校长们 ..... | 69 |

## 永恒的真诚

- 难忘废名先生 ..... 75

## 形塑学科

- 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——中国视野 ..... 83
- 文化自觉与中国梦 ..... 94
- 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与文学研究 ..... 98
- 漫谈女性文学在中国 ..... 105
- 从巫山神女看长江文化 ..... 109
- 我与中国文化书院 ..... 115
- 从北大外出远游 ..... 124
- 世纪末访意大利 ..... 134
- 从“不可见”到“可见”  
——突尼斯国际会议随记 ..... 140
- 中国的文化遗产及其传递 ..... 146

## 评点他人

### 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

- 读《世说新语》随记之一 ..... 153

### 逍遥放达，“宁作我”

- 读《世说新语》随记之二 ..... 156

### 魏晋女性生活一瞥

- 读《世说新语》随记之三 ..... 160

### 40年代的叛逆知识分子

- 读路翎的《财主的儿女们》 ..... 164

### 知识分子浩劫之一斑

- 读王蒙的小说《布礼》 ..... 172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与《跨文化对话》 ..... | 179 |
| 小议知识私有 .....    | 182 |

## 他人评说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 .....        | 季羨林 | 187 |
| 从现代文学到比较文学 .....         | 王 瑶 | 189 |
| 有生命热度的学术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 ——“我的阅读史”之乐黛云 .....      | 洪子诚 | 192 |
|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 ——乐黛云教授 75 华诞特辑前言 .....  | 严绍璿 | 205 |
| 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科重建中的贡献 ..... | 曾繁仁 | 222 |
| 学术的国家意识与国际意识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 ——乐黛云先生的学术视野 .....       | 陈跃红 | 238 |
| 似水流年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 ——印象乐先生与八十年代 .....       | 戴锦华 | 249 |
| 我的老师乐黛云先生 .....          | 张 辉 | 261 |
| “我寄厚望于年轻一代”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 ——《乐黛云学术叙录》编后记 .....     | 张 沛 | 269 |
| 解放自己、解放学科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 ——读乐黛云先生《跟踪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之路》  |     |     |
|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张 锦 | 273 |
| 一种缘分，小径相交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 ——记恩师乐黛云、汤一介学术伉俪 .....   | 张 锦 | 279 |

## 情系未来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1 世纪的新人文精神 ..... | 289 |
| 80 岁感言 .....      | 293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情是幸福之本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295         |
| 我的五字人生感悟 .....                | 298         |
| 与时俱进 别创天地<br>——乐黛云先生访谈录 ..... | 乐黛云 陈戎女 302 |
| 编选后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333         |
| 总后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335         |

性命自出 |





## 父亲的浪漫

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一直是一个追求浪漫之人。20世纪20年代，他千里迢迢，跨越崇山峻岭，到北京来投考著名的北大英文系。他曾接受过胡适的面试，但胡适嫌他英语口语不好，有太重的山城口音，没有录取。他一气之下，就在北大西斋附近租了一间公寓，坚持在北大旁听，当了四年北京大学英文系的自由旁听生。他告诉我当年北大的课随便听，他只听陈西滢和温源宁的课，虽然对面教室鲁迅的讲堂人山人海，他也从不过问。

他不缺钱。祖父是贵阳山城颇有名气的富绅兼文化人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收了好些学生。据说他痛恨自己的先人曾是贩卖鸦片的巨商，立志改换门庭，除一个儿子继续经商外，将其余四个儿子都先后送到北京。后来，一个是清华大学首批留美学生，学化学；一个送到德国，学地质，后来多年担任北大地质地理系系主任；还有一个学医，是抗战时期贵州名医；只有父亲学文，颇有游手好闲之嫌。但父亲并不是一个纨绔之人。记得1976年他和我曾到天安门左侧劳动人民文化宫，去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，他一再和我谈起1924年，他到天安门右侧中山公园悼念孙中山，并步行送孙总理遗体上碧云寺的情景。他对两位总理都深怀敬意，曾对相隔五十余年的东侧、西侧两次悼念，不胜唏嘘。但他却始终讨厌政治，只喜欢读济慈、华兹华斯的诗。

1927年，他“学成”还乡。同学中有人劝他去南京，有人劝他去武汉，他都不听，一心要回家乡，建立小家庭，享人间温暖，尽山林之乐。据他说，途经九江，曾遇一位革命党人，好意劝他参加革命，不想他游庐山归来，这位革命党人已经被抓进监狱，这更使他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，而更坚定了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冬夏与春秋”的决心。

回到贵阳，父亲很是风光了一阵。他穿洋装，教洋文，手提文明棍；拉提琴，办舞会，还在报上骂军阀，都是开风气之先。他又喜欢和教堂的神父、牧师交往，练练口语、换换邮票、看看杂志、喝喝咖啡之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他为此吃了很大苦头，说他是什么英国特务的高级联络员等等，经过多次“触及灵魂的批斗”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。

父亲当年回乡最得意之事就是娶了比他年轻十多岁的我母亲，她是当年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，从此筑成了他多少年来朝夕梦想的温馨小家。祖父去世，五兄弟分家，父亲放弃了其他一切，只要了祖父晚年刻意经营的小小后花园。我记得当时的“乐家大院”是一座很长的大建筑，横穿两条街：大门开在普定街，后花园出口是毓秀里。房屋有五进：第一进是办公待客的地方；第二进是祖父的书房，这两处后来被改建为伯父的临街的诊所；第三进是祖父原来的起居室，祖父去世后，设有乐氏祖宗的牌位，由祖父的姨太太掌管，每天按时进香、敲磬、祭祀；第五进是一些破旧无人居住的旧房。穿过这些荒凉地带就是后花园。

花园里原有一座带飞檐的旧楼，挂着“湘雪堂”的牌匾，有许多玉兰花、紫荆花和古老的银杏树，还有一口养金鱼的大石缸。父亲对这个花园进行了彻底改造，他买来许多外国建筑和室内装饰杂志，自己设计了一幢美丽的小洋楼。那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，在贵阳确是绝无仅有。父亲对自己的杰作满意极了！他常常举行周末家庭舞会，宾客云集，华尔兹、狐步舞、探戈都从这里传播开去。他们在里屋舞兴正酣，我们几个小孩则在外屋把准备好的糖果点心吃个够！

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政府决定要新修一条马路，通过毓秀里，直达体育场。后来父亲告诉我，曾有人来联系，说是只要自愿出一点“捐赠”，马路就可以绕开一些，不一定从父亲的花园穿过。父亲认为如此公然让他行贿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，不仅拒绝，还把来人大骂了一顿。据说原来计划修的马路并非像后来那样，就是因为父亲坚决拒绝行贿，惹恼了父母官，一条大路硬是从我们的花园中央



蛮横地穿了过去。花园中的这个厅、那个楼，当然全都拆得七零八落，林木花草更是一片凋零。父亲已不再有钱将破损的花园修复，只好将房子和地皮都交给当时正在发展的“信谊药房”经营。相约八年内由他们使用，八年后他们占有一半，交还父亲一半。父亲的洋房、洋梦、洋生活就此结束，留下的是他对政府官员的痛恨。记得那时我们每年必须亲自到官府去交“地价税”，父亲说这是他最难以忍受的苦痛，让我替他去。我还没有柜台高，什么也弄不清，常被大小官员们呼来喝去，每次都是气冲冲地返回家。父亲总是安慰我说，你就当去一次动物园吧，狮子老虎对你吼，你也要去对他们吼吗？

卢沟桥事变之后，贵阳这座山城陡然热闹起来，市街摆满了地摊，出售逃难来的“下江人”的各式衣服杂物；油炸豆腐、江苏香干、糖炒栗子、五香牛肉的叫卖此起彼伏。一到傍晚，人群熙熙攘攘，电石灯跳动着小小的蓝火苗，发出难闻的臭味。我却欢喜和母亲一起在闹市中穿行，一边看，一边吃个不停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大约是1939年末，政府下达了学校疏散的命令，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十余里的农村——乌当。先是在一个大庙里上课，后来又修建了一些简陋的草房；教员则挤在租来的民房里。父亲仍不改他的“浪漫”，别出心裁地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，独门独户，背靠小山，地基很高，面向一片开阔的打谷场。

我们一家四口（还有两岁的弟弟）就在这个谷仓里住了差不多一年。尽管外面兵荒马乱，我们还可以沉浸在父亲所竭力营造的一片浪漫温情中。例如我们常常去那座小山顶上野餐，欣赏夕阳。这种时候，我和弟弟在草地上打滚，摘野花，有时也摘一种野生的红荚黑豆和大把的蒲草，母亲会将它们编成一把笤帚扫床。母亲还教我们用棕榈叶和青藤编织小篮儿，装上黄色的蒲公英花和蓝色的铃铛花，非常美丽。这时候，父亲常常独自引吭高歌，他最爱唱的就是那首英文歌“蓝色的天堂”：“Just Mary and me, and baby make three, that is my blue heaven!”

有时我们也一起唱“家，家，甜蜜的家！虽然没有好花园，春兰秋桂常飘香，虽然没有大厅堂，冬天温暖夏天凉……”父亲有时还唱一些古怪怪的曲子，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：“我们永远相爱，天老地荒也不分开，我们坚固的情爱，海枯石烂也不毁坏；你看那草儿青青，你看那月儿明明，那便是我们俩纯洁的、真的爱情。”我至今不知此是中国歌还是西洋歌，是流行歌曲还是他自己编的歌曲。

中学教师的薪水不多，但乡下物价便宜，生活过得不错，常常可以吃到新鲜蔬菜和鲜猪肉。每每到三里外的小镇去买菜赶集，就是我最喜欢的节日。琳琅满目挂在苗族姑娘项链上的小铃铛、小饰物，鲜艳夺目的苗族花边和绣品，还有那些十分漂亮、刻着古怪图案，又宽又薄的苗族银饰，更是令人生出许多离奇的梦幻。唯一令人遗憾的，是没有好点心可吃。母亲于是用洋油桶做了一个简易烤箱，按书上的配方做蛋糕和饼干。开始时，蛋糕发绿，饼干一股涩味，后来一切正常，由于加了更多的作料，比城里点心店买的还要好吃。父母常以《浮生六记》的男女主人公自况，《闲情记趣》一章也就成了我的启蒙读物。那时候，生活真好像就是一首美丽恬静的牧歌。然而，经过多年之后，回想起来，倒也不尽然。

我们住家附近没有小学，父母就自己教我念书。父亲教英语、算术，母亲教语文和写字。母亲是一个追求独立、酷爱自由的女性。据我后来的观察，她与父亲的结合多少有一些“不得不如此”的苦衷。她内心深处总以靠父亲生活不能自立为耻。对于父亲的种种“罗曼蒂克”，她也不过勉强“紧跟”而已，并非出自内心的追求。从我很小的时候起，母亲总是时时刻刻教我自立自强，并让我懂得依靠别人是非常痛苦的事。母亲很少教我背诗，却教我许多易懂的散曲，内容则多半是悲叹人生短暂，世事无常。那首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？总是离人泪”，母亲最喜欢，还亲自谱成曲，教我唱。我至今会背的，还有“晓来清镜添白雪，上床和鞋履相别。人生有限杯，几个登高节！”等等。从后来的许多事实看来，这些选择都体现出母亲内心深处的一些隐痛。其实，所谓牧歌云云，也不过是自己给

自己营造的一种假象。当时，抗日运动在高涨，学校也来了许多“下江”学生和先生。他们教大家唱抗日歌曲，诸如“大刀，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、“工农兵学商，一起来救亡”之类，我都是当时学会的。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美术老师，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吴夔。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夔字太难写，母亲教我写了很多遍。他教学生用当地出产的白黏土做各种小巧的坛坛罐罐，然后用一个铜钱在上面来回蹭，白黏土上就染上一层淡淡的美丽的绿色。他又教学生用木头雕刻简单的版画，我记得刻的大都是肌肉隆起的臂膀，还有喊叫的张开的大嘴。版画上大都刻着抗日的大字标语。学生们都很喜欢他，特别是我的小姨，母亲唯一的妹妹，当时也是贵阳一中的学生。父母在乡间很少招待客人，这位吴先生却是例外，记得他来过好几次，和父母谈得很高兴。于是，来到了大清洗的那一天。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吴先生和两个学生被抓走了，警车呼啸着，穿过我们窗前的小路。不久，传来消息，说吴先生一抓到城里就枪毙了，他是共产党员！接着又有一些学生失踪。母亲把小姨囚禁在家，不让她上学，她大哭大闹要和同学一起去延安。就在这个夏天，父亲被解聘，失了业，罪名是与“共党分子”往来。幸而他们并未搜出学生们藏在我家天花板上的文件，否则问题就不只是解聘了。那是1941年，我10岁。

我们一家凄凄惶惶地回到了贵阳。原来的房子已租给别人，我们无处可去，只好挤进“老公馆”。所谓“老公馆”就是前面说的由祖父的姨太太掌管的一进五间留作祭祀用的公房。父亲失业，坐吃山空。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。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购破烂的金沙坡，去卖东西。几乎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板的玻璃片洗得干干净净，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，装了一篮子，拿到金沙坡旧货市场去卖，但人家不愿买，说了很多好话才卖了五毛钱。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。更难堪的是，当时已是贵阳名医的伯父，事业非常发达。他的私人医院占据了大部分老宅，而且修缮一新。许多权贵都来和他结交。就在同一院内，他们家天天灯火辉煌、宾客盈门。我的六个堂兄弟都穿着时髦，请了家庭教师每天补习

功课。我和他们常一起在院子里玩，每到下午3点，就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分发糖果点心的时候。这时，我们的母亲总是紧关房门，把我和弟弟死死地关在屋里。在这一段时间里，父亲很颓丧，母亲和我却更坚定了奋发图强、将来出人头地的决心。

生活的转机有时真是来得好奇怪！父亲偶然碰到了—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，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，—谈之下，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，事情就是那么简单！我们—家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。说起花溪，也真是有缘分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小镇，—湾翠色的清溪在碧绿的田野间缓缓流淌，四周青山环绕，处处绿树丛生，离贵阳市中心四十多里地，但多少年来，这块宝地却不为人知。大约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三四年，喜爱爬山越野的父亲就发现了这—片世外桃源。那时这里还只—片不为人知、只是苗族聚居的荒山僻野。如果你不能步行四十里，你就绝无可能亲自领略这—派人间仙境。父亲—心向往西方生活方式，也想在城外拥有一间幽静的别墅。他花了很少—点钱在花溪（当时的名称是“花格佬”）买了—小片地，就地取材，依山傍水，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—座长三间的房子，前面有宽宽的阳台，两边有小小的耳房，走下七层台阶，是—片宽阔的草地，周围镶着石板小路，路和草地之间，是—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。跨过草地，是—道矮矮的石墙，墙外是—片菜地，然后是篱笆。篱笆外便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，它是大花溪河—道小小的支流，把大河里的水引向脚下一大片良田。草地的左边是—座未开发的、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。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，却是—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，厕所前面有—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。后来，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，用上厕所作掩护，读父母不愿意我读的《江湖奇侠传》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。可惜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，实际上，抗战前我和母亲只去过—次，是坐轿子去的。那次，新居落成，父亲大宴宾客，游山玩水，唱歌跳舞，又是听音乐，又是野餐，很是热闹了好几天。平时，只有父亲常去，他喜欢步行，认为那是—种很好的运动。

这次重返花溪的机缘简直使父亲欣喜若狂。虽然他的别墅离贵州大学足有十里之遥，他也宁可每天步行上课，而不愿住进大学的教师宿舍。后来他几乎以生命为此付出了代价。他和母亲在这里一住就是30年。20世纪50年代，当我和弟弟都在北京念书时，他忽然得了脑血栓，人事不知，昏迷不醒。那幢别墅修建在苗族聚居的一座小山的半山腰，离镇上的小医院还有十多里路，既没有车也没有电话，一时间更叫不来帮手。母亲怎么把父亲弄到医院，父亲又怎么能全无后遗症地恢复了健康，对我们来说，始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！

我快乐地在花溪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。母亲因为在我就读的贵阳女中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，心情比过去好多了。她担任的课程是美术和劳作。她教我们用白黏土做小器皿，并用铜板磨上淡淡的绿色。我知道这是为了纪念那位被枪杀的年轻美术教师吴夔。母亲还教我们用粗毛线在麻布上绣十字花，她也教我们铅笔画、水彩画、写生和素描。总之，她的教法是相当新潮的。她非常爱艺术，也爱她的学生。总之，我们在花溪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情调：在小溪边野餐，看日落，爬山，做点心，赶集，只是这里的集市要比乌当大得多，父亲又开始快乐地唱起他那些永远唱不完的老歌。

## 母亲的胆识

母亲 14 岁失去父母，独自支撑着并不富裕的家业。她竭尽家资，让比她年长四岁的姐姐去北京求学，希冀学成后再支援自己和妹妹深造。殊知几年后，姐姐大学毕业，一去无音讯，再也联系不上。母亲只好嫁给比她大十岁的父亲，条件是支持她离开封闭的山城，到“下江”（指长江下游发达地区）求学。父亲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，带母亲到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正式入学，让母亲如愿以偿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母亲不情愿地怀上了我，只好返回家乡。我始终愧疚自己成了阻断母亲求学意志的罪魁祸首。后来，就凭这一点艺专的基础，她多年在一个女子中学担任美术和劳作教师，教女孩子们画画、编织、刺绣、做泥塑。父亲多次逼她放弃，说不需她赚钱，只需她管孩子、做家务。但母亲始终坚持，她屡屡教导我要有独立的人格、独立的追求、独立的事业，尤其是女人，必须独立，才能有尊严。

1948 年，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，父亲坚持让我选择后者，说是将来即便以长江为界，南北分治，我也可随时回贵阳老家。但我满心想的都是飞出山城，北上革命。母亲支持了我，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，但默许我一到武汉就去寻找北京大学新生接待站。我揣了家里仅有的七个银元，坐上开往柳州的汽车，换乘湘桂黔铁路（桂黔段尚未建成）。人们都指责母亲，不该让我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孤身出门乱闯，但母亲对我有足够的信心。如果不是母亲的胆识，我整个的生命故事就将全部改写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我在北平的确经历了一段相当艰苦的生活。围城期间，金圆券贬值，物价飞涨。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自治会为了保障大家在围城期间的的生活，创建了一个“面粉银行”，组织同学把手边的钱

都买成面粉，集体保管，随时存取。我当时只有够吃饭的“公费”（每餐只够吃高粱米饭和酱油煮黄豆），此外真称得上身无分文。当时的北平与我的家乡已很难联系上，母亲对我十分牵挂，竟然想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。她不知道如何在贵阳找到一个卖猪肉的老板，他有一个哥哥在北平也卖猪肉。她给了贵阳的猪肉老板60斤猪肉的钱，让他的哥哥北平的猪肉老板转手付给我60斤猪肉的钱！此事竟大获成功。由于母亲的智慧，我居然在自治会的“面粉银行”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两袋面粉。

建国后，中学美术劳作课全部取消，母亲失业。她本可在家歇息，但却立即开始了寻求适应新社会的独立之路。当时大、中学一律开设俄语课程，最紧缺的就是俄语教师。年近半百的母亲竟然下定决心学习俄语，从字母学起！她报名参加了贵州广播电台举办的俄语教学班，苦学两年，通过了各个层次的考试，终于拿到了俄语初级教师合格的文凭。此后她多年在贵州农学院教大一俄语，由于她的勤奋和钻研，一直得到学生好评。

就这样，十年如一日，父母都到了退休年龄。那时，我在北大，弟弟在清华，妹妹在北京铁道科学院。母亲以极大的毅力，处理了老家的各种事务，迁居到北京，在北大与清华之间被称为“城府”的旧居民区的一条小街——槐树街，买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。地方虽小，母亲却着意经营，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梨树、一棵桃树、一架葡萄，还有遍地的太阳花。我们常带着孩子回家，从来没有看见母亲这样高兴！她认为经过多年离散，现在总算圆满团聚了！可惜这样的快乐日子不过短短两三年！

北大、清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把母亲吓得目瞪口呆！几乎天天有批斗黑帮的游行队伍从家门前走过，不懂事的、在街道上游荡的孩子们不断向他们扔石子、吐口水；著名学术权威翦伯赞被驱逐到城府小街的一间破民房内，孩子们不时给他们在路边煮饭的煤球炉子浇水，让他们吃不成饭！翦师母常常出来央求孩子们不要浇水，让他们煮一顿饭！整个北大、清华地区处处是武斗之声不绝于耳！母亲知道我和她一向看重和宠爱的女婿就在这被“游斗”的行列中！她完全不能理解这一切，但谁又能给她解释呢？她能想到的只是给我们做一点好吃的菜，我每天

劳动后可顺路带回我自己的家。

武斗越来越激烈了！我们所住的燕南园位于学生区中心，学生住的大楼顶上都有用自行车内胎制造的强力弹弓，学生区内常常是砖头横飞，当一个路过的孩子误被砖头砸死后，我终于决定不能再让我的两个9岁和13岁的孩子再住在这个区域了！他们到处乱跑，还“誓死”支持两派中的一派，帮他们爬树摘另一派的高音喇叭，分发传单、宣传品、报纸等。母亲知道后，立即将他们关进了自己的小四合院，不许再出来。可惜只住了两天，第三天，街道革委会就找上了门，指责母亲留住“黑帮子女”而不报告。母亲气极声辩，但哪里有理可说？最后街道革委会摔下话：如果要留住，就必须给两个孩子挂上“黑帮崽子”的牌子，以示分清“革命”和“反革命”的界限！母亲尽管有胆有识，却从未经历过这样残酷无情、无理可讲的场景！顿时气得脸色煞白，说不出话！她当然不会让两个钟爱的外孙忍受这样的屈辱！在清华教书的弟弟让我当夜就在大雨中把孩子接走。

第二天，母亲头痛剧烈发作，送到海淀医院。医院一片混乱。医生都或在挨斗，或在打扫厕所，当权管事的是“革命派医护人员”！他们下令给母亲抽脊髓化验，但母亲的病本来是一般性脑血管瘤，抽脊髓必然引起大出血，这是常识！母亲顿时昏迷，再也没有醒过来！我和弟弟在母亲的病房外，守了一夜。半夜时分，弟弟号啕大哭，我紧握他的手，无话可说。我知道他的悲痛不只是为母亲，也是为这不可理解的社会、不可预知的未来和一切美好的梦的破灭！

黎明，我和弟弟将母亲送上八宝山平民火化场。那里的景象触目惊心！许多尸体横七竖八地摆放着，等待火化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好些是满身血迹，大约都是被打死的“牛鬼蛇神”，还有不少十七八岁的孩子，他们是“黑帮崽子”或两派打仗牺牲的无辜生命！这些尸体本应在黎明前处理完毕，但时间不够，只好摆放在那里。

我和弟弟好不容易逃出了这个人间地狱。我们抱着母亲的骨灰盒回家，将它安置在小四合院的正房，放上母亲的照片，没有鲜花，没有悼唁！奋斗终生，有胆有识的母亲就此长眠，享年56岁。



## 伯父的遗憾

我从燕南园小斜坡下来，从文史楼经过地质楼去中关园。远远看到路边一群红卫兵在围斗一个什么人，这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是常见的风景，并不以为奇。正想离开，忽然听到红卫兵高喊：“打倒反动权威乐森珩！”“乐森珩不投降就叫他灭亡！”乐森珩是我的伯父，他是古生物学家、地质学家，第一批学部委员，科学院院士。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，30年代在德国马堡大学师从著名古生物学家魏德肯教授。回国后，创建并领导了贵州省的地质矿产勘测与研究。1953年，他在四川江油县发现了3亿年前生长在我国远古时期的特殊古鱼类化石，经专家鉴定，命名为“乐氏江油鱼”，并被列为当年地质考古界的重大发现，载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》。1964年他的专著《珊瑚化石》出版，被认为代表了当时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水平。同年，他担任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。我这位伯父一向自命为纯粹科学家，不问政治。目前，他以什么借口被围斗呢？

走近一看，一个红卫兵正指着我伯父说：“叫你背毛主席语录，你一条也背不出，教授怎么当的！？算了，你就背一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吧！这总该会吧！”伯父从来远离政治，没有任何“反动”关系，历史清白如水。造反派确实没有抓到他任何把柄，对他还算客气。伯父磨蹭了半天，终于嗫嚅出一句：“我记得是劳动与生产相结合吧！”他的话引起红卫兵一阵哄然大笑。那位问话者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亏你还是个大教授，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都背不出！你要好好接受革命群众的再教育，好好竖起耳朵听着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是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记住了吗？先连着背十遍，明天我们再来考你！”快到吃饭时间了，革命群众一哄而散。伯父踉踉